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马
络

蚕食与鲸吞

——
侵华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

花山文艺出版社

06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蚕食与鲸吞

—侵华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

马 轲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1937年“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本书着力记述了这一事件，以清晰的条理，从多重的角度，揭露了日寇垂涎华北，实行政治讹诈和武装侵略的罪恶行径。读毕此书，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被再次证明：“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殿 陈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蚕食与鲸吞

—侵华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

马 轲

责任编辑：陈 新 申 强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13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10-9/I·600

目 录

第一章 幽远的阴谋.....	(1)
1. 贪得无厌的“大陆之梦”	(1)
2. 冈村宁次说：一字不能变更	(8)
3. 被扼杀的抗日行动	(15)
4. 野心难捺的“天羽声明”	(21)
5. 如法炮制的城下之盟	(27)
6. 夹缝中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33)
7. 从“广田三原则”到“国策基准”	(40)
8. 对峙丰台镇	(46)
9. 又是一出“鸿门宴”	(54)
10. 近卫内阁——战争加速器	(60)
第二章 凄厉的枪声.....	(68)
11. 夜晚 11 点，枪声骤响	(68)
12. 缓兵之计	(76)
13. “不扩大”是假，迅速增兵是真	(82)
14. 日本举国若狂	(88)
15. “和平”烟幕再一次迷惑了宋哲元	(94)

16. 逼到悬崖	(100)
17. 硝烟处处	(105)
18. 最先以身殉国的将领	(112)
19. 铁蹄踏向四面八方	(120)
20. “以华制华”的卑鄙伎俩	(126)
第三章 凶残的杀戮	(134)
21. 东条兵团大开杀戒	(134)
22. 人人切齿的板垣、“土匪原”	(140)
23. 屠夫何止藤田茂	(146)
24. 残害俘虏是日军的普遍行为	(152)
25. 骇人听闻的活体解剖	(158)
26. 惨无人道的毒杀	(164)
27. 灭绝人性的强奸	(171)
28. “以战养战”和“以毒养战”	(178)
29. 野蛮粗暴的文化扫荡	(185)
30. 人性复苏后的忏悔	(192)
尾声 共赴国难	(199)
主要参考书目	(207)

第一章

幽远的阴谋

1. 贪得无厌的“大陆之梦”

“卢沟桥事变”发生在7月7日这一天也许偶然，但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却属必然。

列宁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之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

早在日本明治元年（1898年），天皇就在《宸翰》中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集封建专制与军事强权于一身的帝国，坚持不懈地把吞并中国作为“国策”，年复一年地做着“大陆之梦”。

日本版图纤细，中国国土辽阔，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妄想以蛇吞象。于是，它张开血口毒牙，裹挟着滔滔海浪，膨胀着疯狂的激情，频频扑向它的邻邦。

日本的一位启蒙思想家堂而皇之地说：

“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奠基人大川周明公然鼓吹：

“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

他为日本描绘了一幅美妙诱人的扩张蓝图：

“把日本、满洲、中国共同划为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而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

1927年6月至7月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确立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政策，声明将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涉。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后向天皇呈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称：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也……较我日本帝国领土大逾三倍，其人口仅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敌。”“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于是，日本的扩张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开始紧锣密鼓地精心策划。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准抵抗。日军长驱直入，攻城占地，不过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即全部沦陷，3000万东北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殖民地生活。

面对奇耻大辱，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爱国将领也屡屡进谏。然而蒋介石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说：“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

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

他指望“国际公理”制止日本的侵略。结果国联调查团到中国转了一圈，虚应故事，发表了一份没有认定日本是侵略者的报

告书。随着日本退出国联，这一切也就不了了之。

日本占领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后，全力消灭东北抗日武装，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1932年4月，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在30万人以上，经过日军的反复“讨伐”，到1933年春，绝大部分先后失败，无数将士惨遭屠杀，抗日救亡斗争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同时，日军还制造了平顶山、海兰江、土龙山、老黑沟等屠杀平民百姓的惨案，黑土地上血肉横飞，白骨累累。

樱花之国的当权者决不像樱花那样温情脉脉。

他们是豺狼虎豹，哪里有肉哪里就会出现他们的利爪。

他们永不知足。他们毫无顾忌。他们信奉的是“百卷的万国公约不如数门大炮，几册的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国际舆论对他们毫无约束。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丝毫没有使他们良心发现。他们只信奉武力，只习惯于弱肉强食。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

2月21日，日本武藤信义大将率领10余万日伪军进攻热河。3月4日，128骑日军哨探热河省会承德，向天空砰砰放了几枪，负责防守的汤玉麟掉头就跑，并用汽车和骆驼队装满私人财产，一口气跑到了天津英租界。承德既失，热河随之沦陷。

张学良暴跳如雷，明令缉拿汤玉麟，指令卫队：“追到天边也要把他给我抓回来！”

山海关、热河相继失陷于日寇之手，全国舆论哗然，愤怒谴责国民政府，也谴责张学良。

张学良发誓反攻热河，他激动地说：“仗打到这个样子，还不如对日宣战，拿出全国力量一拼。我有决心亲临前线，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

然而，蒋介石正准备牺牲张学良换得对日妥协。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在专列上，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就板着脸孔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

从蒋处回来，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说：“现在日本要灭我民族，蒋先生却仍要以和为主，局势将演变到何种地步？人骂我不抵抗，天知道这罪名要背到哪一天？我相信一句话：人民可欺骗于一时，却不能欺骗于永远。”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偕夫人、子女出国“考察”去了。

这时候，长城边上激战正酣。

日军既占热河，乃向长城推进，意欲越过屏障，进逼中原。

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调往该方面增防的原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主力乘敌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由于双方白刃相接，距离很近，使得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威力。宋哲元和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部队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万死不辞，阵地几次失而复得。特别是500名大刀队员，一个个赤臂前进，悄然摸入敌阵，挥舞大刀猛砍猛杀，将千余名日军消灭殆尽，500名壮士生还者仅二十余人。经过七昼夜的殊死搏斗，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后来日军突然打开友军防守阵地，使二十九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宋哲元才不得不下令撤退。此役二十九军歼敌3000余人，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伤亡达5000人。日军称，他们“自明治维新练兵以来，无此重大损失”。

这是中国军队自日军入侵东北以来的第一个胜利。二十九军从此名扬四海。当时，著名音乐家麦新为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谱写

了雄壮的战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徐庭瑶的十七军在古北口、南天门的抗击同样惊天地、泣鬼神。先头部队关麟徵的二十五师到达古北口时，日军已击败了原来的守军。关麟徵亲率所部争夺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仍继续指挥。在极为险恶的条件下激战三昼夜，全师伤亡 4000 余人，团长王润波阵亡。日军原来一路呼啸，气焰嚣张，如今遇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虽有优势装备，仍死伤 2000 余人，不得不承认此役为“激战中之激战”。在南天门战斗中，先是关麟徵的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又被打残了，刘戡的八十三师又顶上去，节节抵抗，节节撤退，是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战斗最剧烈的一次战役。

这期间还有极精彩的一笔：

日军占领古北口各高地后，惟独 A 高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原来那是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联络中断，未及撤退，此时仍在顽强抵抗。日军派出一个联队，在飞机和远程炮的掩护下昼夜强攻。A 高地的火力虽然很弱，但还是用子弹和石块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先后毙伤日军百余人。两天两夜的炮火，日军将 A 高地的石头都削去一层。当日军消灭该哨，打扫战场时，发现弹尽粮绝的七名中国士兵无不伤痕遍身。日军官兵既非常气恼，又十分敬佩。旅团长说：“无论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在 A 高地的战死者，统统是民族英雄，他们各自为着自己的

民族而牺牲，应该受到尊敬。”于是，把七名中国士兵的尸体埋葬起来，并立一石碑，上刻“支那七勇士之墓”。

一种精神居然震撼了敌人，难道不足以使那些苟且偷生者汗颜吗？

日军突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后，步步紧逼。

5月17日，唐山陷落。18至19日，密云、三河、蓟县相继易手。日军前锋进逼到离北平市区只有50公里处。18日，日本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煽动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旧部在滦州宣告“独立”。接着，他又唆使无赖之徒向天津日本租界的海光寺投掷炸弹，并炸毁在北平的日本海军武官室的菊花纹章，借以制造中国社会不安，需要日本增兵的理由。

20日，发生了一个中国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馆卫兵的事件。天津日军随即引据《辛丑条约》打出“出兵防卫”的招牌，调派步、炮兵600人开进北平城内。

22日，日军占领平谷、香河，进逼通州、牛栏山。

至此，日军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然而蒋介石的方针依然是不抵抗。日军占领冀东二十余县，兵临天津城下，举国震怒，北方军民欲倾全力抗击日寇。蒋介石急忙从江西调兵到保定，不是支持抗日，而是阻止抗日：“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他认为，这时倾力抗日，与其说是抵御外侮，不如说是帮着共产党打天下，目前的中心工作仍是“剿共”。

于是，蒋介石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与已在北平的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一起，办理华北的对日交涉，以求日军偃旗息鼓。

长城抗战中，蒋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他听了一下高级将领的汇报，明确表示不能再指望增加援军，然后讲了一番空洞的官话，到碧云寺拜谒了一下孙中山衣冠冢，就回南昌督促“剿共”去了。

何应钦深知蒋介石的用心，所以在军事上消极抵抗，在外交上积极交涉。其作战计划完全是防御性的，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失地。因此，尽管许多将士英勇杀敌，却丝毫不于事无补，一座座城池照样陷落。不管战事如何紧张，何应钦等人依然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他们照样玩高尔夫球，照样打猎，甚至到颐和园去打浮冰绿水间的野天鹅，也不管刹那间美丽的天鹅凄厉而散是如何煞风景。他们居然有时住进著名交际花杨惜惜豪华的公馆里，在温柔乡里处理军国大事。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此之谓也。

何应钦在中国人面前威风如虎，在日本人面前则胆小如鼠。

当时北平城里的中国驻军入夜即实行戒严。但常在苏州胡同一带活动的日侨却不守戒严令，东奔西窜。驻军哨兵有时看见，即让他们站住盘问。一日，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当即火冒三丈。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到居仁堂找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站岗的宪兵要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居然同意三人同进。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

何应钦道：“酒井先生，你采取这种举动是不礼貌的。”

“礼貌？我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不得不带武装护兵自卫。”酒井气呼呼地说。

何应钦问其缘故，酒井当即编了一套谎话：“昨天晚上你们的哨兵非常粗暴，他让我跪下，拿着大刀想杀我。你看，我离开武

装保护能行吗？”

“有这样的事？”何低语。

酒井理直气壮：“念何将军是我的旧相识、老同学，我才来当面抗议。不然的话，只怕日本方面早已自由行动起来了！”

何应钦连连道歉。尔后，他又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一定要客气、要礼貌。

5月24日，日军迫近顺义的时候，九架日本飞机突然飞过北平上空，忽高忽低，左盘右旋，其势咄咄逼人。

何应钦大惊失色，赶紧躲进了假山下。

2. 冈村宁次说：一字不能变更

黄郛奉蒋介石命令到华北，带的都是“日本通”。如殷同、袁良、李择一、刘石荪、殷汝耕等，与日本都有历史关系。殷同是日本军需学校出身，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陆军部科长。袁良在日俄战争时曾在日本鸭绿江军川村大将部下，充任陆军少尉翻译，改姓清水。李择一经手买过日本军舰，与日本海军方面颇为熟悉，黄郛未到华北前与日本海军来往，都是通过李择一的关系。刘石荪是日本洋行买办。殷汝耕幼年就在日本读书，归国后与日本关系甚密。

这么一帮人办理对日交涉，能办出个什么结果来，是不言而喻么？

黄郛一到华北，就派殷同去大连，与伪军头子李际春接头，又去长春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就停战预备工作交换意见。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保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

杰”。他参与制造过“济南惨案”、“上海事变”，这时被关东军委任为负责华北交涉的全权代表。当中方人员探询日方意图时，他早已成竹在胸，并设下陷阱：故意透露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以便到谈判时拿出真正的条件，让中国方面出乎意料，产生某种似是而非的满足。

1933年5月22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馆代办中山详一约见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一见面就说：“我早就接到我政府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前此贵国有几位来我方谈和的，都是以个人身份，并非代表中国任何方面。现在事态紧急，日军东至通州，北到密云。若是我们谈和，请问阁下，我应找贵国哪一位去谈？”

何应钦一怔：大军压境却又主动求和，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一面疑惑，一面答道：“你就找黄郛委员长去谈，我请他随即与你联系。”

日军侵华的方式一直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因此，这时日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达到极限，他们担心再往前走一步即可能遇上坚守北平的中国军队的拼死反抗，这才有战犯求和的举措。

中山详一走后，何应钦尚未想出个头绪，就立刻给黄郛打电话，说明中山代办来访之意，请黄抓紧时间办理。

黄郛即命秘书李择一联系。李择一当夜报告：“日方要求不带任何人立即惠临一谈。”黄马上赶往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官舍与中山详一会晤，在场的还有日本公使馆海陆军辅助官，直谈到深夜方散。

黄郛顶着满天繁星，兴冲冲地来到居仁堂，向何应钦说明与中山代办交涉情况。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二、日军亦不越过上述之线进攻。三、

军委会北平分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代表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员表示停止之意。四、以上正式约定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

这一条停战线，是要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以南达二百公里，更不要说归还失地了。对如此屈辱的条件，黄郛居然忍下了。因为原来关东军要求中国军队必须退出北平撤赴保定，现在的条件已经很宽大了，所以黄郛心里美滋滋的。他催促何应钦快拿主意：“如果能够同意，我马上电话通知日方中止攻击。”

何应钦握着烟斗，一口接一口地喷云吐雾，最后说：“叫他们来研究一下吧。”

于是叫来了黄绍竑、张群、熊斌、李择一、王伦等人。他们也像何应钦一样，要么喷吐烟雾，要么长吁短叹。

黄郛再次强调：“由日本公使馆方面得到的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对北平的进攻，用外交的方式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 24 小时之内给他们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

李择一当即同意黄郛的意见。张群其实也同意，但他不说话。

沉默良久，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军政部厅长王伦说话了。他的嗓门很高：“我看还是守北平。我们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们轰完，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吃一些亏，然后他们对日本人骂去，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呢！”

他这些激愤的话，没有一人赞成。

何应钦还是拿不定主意，仍然想撤退。

内政部长黄绍竑拿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见：“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

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可能就立刻出现，敌人就利用伪组织作为对手与它签订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而平津已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然后把北平交由徐军长（徐庭瑤）作背城一战。我们那时候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

大家都以为然。但何应钦仍以未曾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而心存顾虑，他觉得这件事太重了。那时北平和牯岭长途电话还不通，打电报请示又来不及。这时黄绍竑说：“委员长要我们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来不及等到君命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嘛！”

张群、熊斌等表示支持黄绍竑的意见。

何应钦于是给黄郛布置：“你转告日方，就说我们同意。我再写封信，你出示给他们看一看。”

王伦见做出这样的决定，哼了一声，就咚咚地踏着地板，愤愤地上楼睡觉去了。他的抗日激情得不到支持，心中郁郁不乐。一次在中南海骑马，神情恍惚，堕马触树，头破身死。

何应钦刚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23日忽然接到日本公使馆卫队长栗饭原亲自送来的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份抗议书。说的还是那件刺杀案，内称：“蒋介石派军官赵京时，把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卫队门岗刺伤，有意威胁，使我军忍无可忍，将采取断然行动……”

昨夜黄郛说谈得挺好，这时怎么又节外生枝？何应钦莫名其妙，遂把北平军分会参事陶尚铭找来商议。陶尚铭仔细阅读后说：“此抗议书若在黄委员长与中山会谈以后发出，无异最后通牒。查

其发出时间为20日，乃在会谈以前，无甚关系。按一般外交惯例，此项抗议应通过天津总领事馆交给河北省交涉员或省公署，今既送到部长这里来，也不能不理它。但不必由部长直接办理，可交给北平军事当局去办，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最相宜，一则他是地方武职官，二则他和栗饭原在日本陆大是同班同学，可以向栗饭原说私话。”

何应钦一想有理，就对王树常说，并说：“这事就请你来办吧！”

王树常立即给栗饭原打电话，栗饭原约王24日上午到日本公使馆晤谈，但请王不要走兵营大门。

次晨，王树常带陶尚铭往访栗饭原，解释说：“赵京时不是蒋的军官，乃个人行动。把贵军门岗刺伤，不胜遗憾。”

栗饭原根本不念同学情面，冲着王树常就高声嚷叫，坚持说赵某就是蒋指使出来的。王、陶见情形不对，难以继续谈下去，只好起身告辞。

不料这时栗饭原顿改前态，客气地请王、陶稍坐，令人重献茶点。他语调平缓地说：“今把两国置于最恶劣的场合之下是很不幸的事。若能将原因消灭，这类小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的。”意思是倘能按照日本的条件停战言和，这件交涉案件算不得多大的事。

软硬兼施，意在讹诈。日本惯搞这一套，并且屡屡得手。

赵京时的行动受到国人的好评，许多青年奉其为英雄。出于这种压力，黄郛就叫殷同找日本公使馆柴山武官要求引渡，柴山回答要找机会。过了几天，日本皇后生了太子，日本人当作大喜事，于是柴山给殷同来电话，让他去引渡赵京时。

赵京时见到殷同，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我见日本在我国横行，气愤极了，就到打磨厂王麻子刀铺买了一把尖刀。当时又看见日本飞机在城上边乱飞，一时感情冲动，雇了一辆汽车，跑到东交